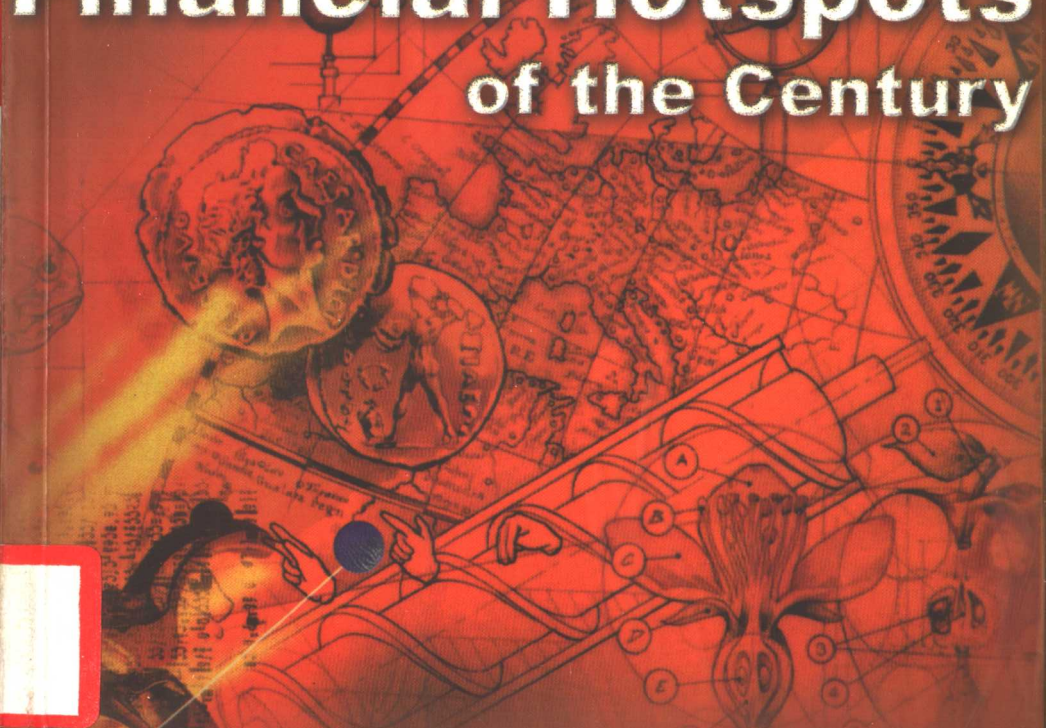


华南金融研究所 著
总策划：傅柏松 刘庄

世纪 金融热点

Financial Hotspots of the Century



广东经济出版社

华南金融研究所 著
总策划：傅柏松 刘庄

F831-53

H1685

世纪 金融热点

Financial Hotspots of the Century



S8K7/04

广东经济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世纪金融热点/华南金融研究所著. —广州: 广东经济出版社, 2000.10 (2001.1 重印)

ISBN 7-80632-780-0

I. 世… II. 华… III. 金融-研究-世界 IV. F831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00) 第 52979 号

出版发行	广东经济出版社 (广州市环市东路水荫路 11 号 5 楼)
经销	广东新华发行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印刷	广东邮电南方彩色印务有限公司 (广州市天河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工业园建工路 17 号)
开本	850 毫米×1168 毫米 1/32
印张	13.75 2 插页
字数	336 000 字
版次	2000 年 10 月第 1 版
印次	2001 年 1 月第 2 次
印数	5 001 ~ 7 000 册
书号	ISBN 7-80632-780-0 / F · 381
定价	23.80 元

如发现印装质量问题, 影响阅读, 请与承印厂联系调换。

读者热线: 发行部 [020] 83794694 83790316

(发行部地址: 广州市合群一马路 111 号省图批 107 号)

·版权所有 翻印必究·

感谢美国安泰国际保险公司

对金融科研与金融教育的支持与帮助!

前 言

时光如电，转眼千年。回首千年世界，我们是欣喜的，因为整个世界在这一千年内由蒙昧走向文明，由落后走向先进，由封闭走向开放；回首千年中国，我们却是担忧的，因为整个中国在这一千年里由相对极盛走向相对极衰，由相对先进走向相对落后，由较为开放走向闭关锁国。世事幻变，令人唏嘘。好在，千年之末，中国终于走出了颓势，对市场经济的最终选择，对开放的不懈努力，对民生的深切关注，标志着一只睡狮正在觉醒。

经济金融形势的瞬息万变，使得我们每一个经济金融学者都要跟随时代的变化不断思索。基于此，华南金融研究所在千年之交、世纪之交推出著作《跨世纪的中国金融业》（广东经济出版社 2000 年 1 月版）之后，马上组织研究人员跟踪当前金融业的热点问题，组织研讨，深入研究，最终形成了摆在读者面前的这一本新著——《世纪金融热点》。

华南金融研究所的两位特约研究员——白钦先教授和陆家骝教授，以前辈的关怀关注着研究所的成长，并以他们独特的视角分析了经济金融形势和金融可持续发展问题，使本书得以建立在一个很高的理论高度上，他们的开拓精神激励着后学。

本书的写作分工如下：

引言《当前经济、金融形势分析》由特约研究员白钦先教授撰写；《金融可持续发展的成本收益分析》由特约研究员陆家骝教授撰写；《混业经营与分业经营的选择》由彭志军和李华民撰写；《中国金融业营销创新的策略选择》由刘志梅撰写；《零售业务不可忽视》由罗明忠撰写；《国际银行业购并的沿革与现状

分析》由李石凯撰写；《国际货币体系的改革》由马飞撰写；《WTO与中国金融业的开放》由甘寿国和李义撰写；《金融资产管理公司和不良资产处理》由周立撰写；《金融机构风险防范与处置》由伍绍平和韩俊梅撰写；《西部开发及金融援助》由刘芬华撰写；《金融发展与金融教育的应对策略》由傅柏松和刘庄撰写。全书由名誉所长傅柏松、刘庄总策划，由伍绍平、周立、甘寿国、李华民总纂。

目 录

引言：当前经济、金融形势分析.....白钦先

金融发展问题

金融可持续发展的成本—收益分析..... 17

银行经营问题

混业经营与分业经营的选择..... 47

中国金融业营销创新的策略选择..... 83

零售业务不可忽视..... 125

国际金融问题

国际银行业购并的沿革与现状分析..... 167

国际货币体系的改革..... 215

金融开放问题

WTO与中国金融业的开放..... 259

不良资产问题

金融资产管理公司和银行不良资产处理..... 289

风险防范问题

金融机构风险防范与处置..... 347

西部开发问题

西部开发及金融援助..... 377

金融教育问题

金融发展与金融教育的应对策略..... 413

引言：当前经济、金融形势分析

一、对当前经济形势的整体判断

对于我国目前经济的运行态势的表述，我赞成使用“紧运行”这个词，不赞成使用“通货紧缩”这个词，更不赞成将它同国际上许多国家近一两年来出现的“经济紧缩”相等同，因为它们产生的经济社会背景、原因以及时间因素都无很大的相关性。我国以往的经济是以总供给不足为基础特征的，而现在出现的某种总供给“过剩”或某种总需求“不足”，表明我国国民经济经过20年的改革开放和转轨运行以后出现了一个历史性的转折，表明我国国民经济总体上上了一个新的平台，表明经济机制开始出现根本性的转变，已经转变到越过“拐点”的新阶段，这是大好事。同时也表明，随着我国综合国力的提高，增长方式的转变，我国的经济增长和发展开始不再主要依靠经济高增长、高速度这一量的扩张来维持，而可以在中高速(纵向比较是中高速，横向比较仍是高速)的状态下主要依靠内涵深化与质的提高来实现经济的稳定发展。尽管当前仍存在许多困难，面临着严峻的形势；但我们终于能挺得住，终于可以依靠自身的内功来消化这些困难因素，这是难能可贵的。只要紧运行的“紧”能控制在一个合理的限度内，就不必惊慌，就不一定是坏事，而可能是好事。就业的压力，安排下岗职工的压力，并非仅仅是来源于经济增长速度的某些并不很大的下

降，更有许多历史的累积等社会因素，还有许多结构性的因素，以及必须付出的改革代价或成本。假如我们顶不住就业的压力，再简单地一味依靠经济高速增长、外延高速扩张的老办法来解决这一问题，那就可能前功尽弃，又回到原来的旧轨道上去。我们千万不要犯叶公好龙的毛病，不能天天想龙、月月盼龙，翘首待龙来，真龙终于来时又怕得要命。

换个角度来考虑我国经济目前的运行态势，我们可以得出“目前经济形势不错”的结论。因为我们面临的困难正好为我们进行经济结构调整提供了一个可供选择的良好机会，困难迫使我们必须进行调整。在“繁荣昌盛”到没有轱辘的冰箱都是紧缺货的时候，市场无从选择应该淘汰的企业；而在经济紧运行中，市场自然选择淘汰对象，又何必政府去苦苦寻求。能存活下来的企业都是具有生命力的，有发展前景的，其产品也是符合市场需要的，“岁寒然后知松柏之后凋”嘛！

二、国有企业病理与诊治

说到国有企业，有一点必须清楚：即国有经济尤其是国有企业奠定了我国国民经济与国防建设现代化这一庞大体系的物质与技术基础，并承担了其近20年改革与开放的几乎全部改革成本。正因为如此，非国有经济才得以在相对宽松的条件下生存与发展；也正因为如此，才导致了国有企业本身困难的积累和加剧。看不到这一点，或者虽然注意到这一事实而不给予充分的估价与肯定，都是不实事求是的，因而也是不公平的，它对我们今后的改革与开放不利。

（一）“谁的孩子谁抱”和“抓大放小”这一就国有企业抓国有企业的思路是不可取的

这是因为：首先，我国有几万家国有大中型企业，国有企业资产存量近6万亿元，是50年来国有经济历史累积的结果，是全部物化了的资产，它们分别以土地、厂房、机器、设备、原料、产成品、技术以及管理经验、商标、品牌、信誉、知识产权等无形资产的形式，分布在全国30多个省市自治区的不同产业和不同企业中，产业层次非常低，结构严重不合理，趋同化现象又非常严重；其次，许多国有企业在计划经济体制下，实施统收统支、统购统配、统调统拨原则，该拿走的都拿走了，能拿走的都拿走了，拿去新建扩张了别省别市别类国有企业，或是发展了种种其他事业，却将就业、住房、退休、劳保、环卫和教育等包袱甩给了原有企业或原属地方，有的企业其物质资源早就“枯竭”了，例如以某一矿产为主体产业的城市（辽宁的抚顺、阜新，山西的大同），要他们在原有基础上就地将某一国有企业搞好，这是不可能的；再次，从产业结构或技术水平的角度讲，有的国有企业或行业，必须整体解决问题，也就是说国有企业必须“搞死”一批，才能“搞活”一批，最后才能新建一批。

有鉴于此，我们必须从根本上转换思路，高瞻远瞩地从总体和宏观的层面对国有经济进行根本性的结构调整：或“生”、或“死”；或进、或退；或小变大、或大变小；或关闭、或破产；或兼并、或重组；或新建、或扩建；或租赁、或拍卖。而绝不是不分青红皂白地将一家一家国有企业就地不惜一切代价地都“搞好”，也绝不可能都搞好。在这个意义上讲，“抓大放小”也是文不对题的，要搞好国有经济，关键是彻底的战略性的结构调整和



市场退出，而不是纠缠于简单的企业规模是“大”还是“小”，是“抓”还是“放”的问题。

妨碍我们从国民经济、国有经济这一宏观角度思考与处理国有企业问题，或者说造成我们以往总是从局部、微观和就地一家一家地搞好国有企业的角度思考与处理国有企业的主要原因有三：

一是几万家国有企业的6万亿国有企业资产存量已经都物化了，按地地域凝固了，都“死”了，难以在原有的实物形态和本系统、本省、本市范围内搞活，不能跨产业、跨行业、跨企业、跨地区自由流转，要流转就必须设法将实物资产金融资产化，证券资产化，就要形成发达的资本市场和需要发达的投资银行业务的提供，而这将是十分困难的。况且也不是所有的“存量”都能金融资产化、证券化，有“供给”就一一对应地相应有“需求”，有的“存量”原来就是“无”、是“空”，是已“流失”、是已“灭失”或已“过时”，因而不能一一对应。这种由变现化、金融资产化产生的巨大资金缺口由谁来弥补？补给谁？跨企业、跨产业、跨地区的种种矛盾谁来协调？

二是跨企业、跨产业、跨行业、跨地区调整流转产生的经济与社会问题这一巨大流转调整成本由谁来承担？由于一个个企业的“死”，跨企业、产业、地区流动后留下的就业、保险、社会保障、环境保护和教育问题由谁来承担？这些都既涉及政治体制和经济体制问题，会使原来许多还可以模糊、拖延与回避的问题变得表面化、清晰化和尖锐化；也涉及巨大的经济和金融问题，中央政府无力承担，受益地区或企业不愿承担，受损或灭失企业或地区也无力承担。

上述两大问题和困难，很容易逻辑地得出“谁的孩子谁抱”和“抓大放小”这种万不得已的机会主义结论。

(二)从国有银行是最大的国有企业的角度看 债转股

债转股有两个现象值得深思：第一个现象是，债转股这一招是由经济学家提出的，而不是金融学家或金融工作者提出的，这是很值得思考的。第二个现象是，债转股是在银企关系最为紧张的时候提出的，这说明债转股的产生背景是不好的，这一点让我感到忧虑。

债转股是一个涉及一国基本产业结构、产业政策、政企关系、银企关系、竞争与垄断，特别是对社会与政治生活的垄断等联系在一起的重大问题，我认为不能简单从事，更不应该从解决某一重大困难的这种实用主义的角度提出与实施。人们从解决国有大中型企业困难的角度，提出将银行债权变股权，但不要忘记国有银行也是国有企业、而且是全国特大型国有企业这一事实，它是我们党和国家稳定社会发展经济的最后一张王牌。如果债转股的实施把我们这张王牌给转丢了，那么后果将不堪设想。当前国有工商企业面临着种种重大困难，国有特大型金融企业面临的困难同样也很大。这一点切不可忽视，我们必须更为冷静和全面地思考与权衡。

对于债转股政策的实施，我们必须注意到其运行的负效应。在我们民族历史上，商业信誉信用的观念本来就比较薄弱，而改革开放以来这一观念更为薄弱，在某些情况下简直就是堕落。有人理直气壮地借钱不还钱，还振振有词：“要钱没有，要命有一条”，“没钱不还，有钱也不还，谁还谁是傻瓜。”前一段时间某一资产重组公司刚刚成立，社会上就传出债转股新招，许多企业的头头追悔莫及，说：“早知能债转股，我何必要还钱呢！”联系



近两三年来许多地方企业破产重组时，专拣欠银行贷款多的企业破产或重组，这种由破产重组形成的“逃债”、“废债”风，岂不更令人深思？所以必须充分估计由债转股产生的“企业欠债可以不还，谁还谁吃亏”这一暗示与诱导的严重社会经济、金融后果。

债转股政策出台并开始运作了，我们还是肯定现在所走的这条道路是正确的，它至少能达到这样一个目的，就是把旧的不良资产同新形成的不良资产分开，可以化解不良资产和实现资产重组。要解决不良资产这个问题，就要产生资产评估价值与原资产价值之间的缺口，中央已经作出决定，这个缺口由财政负担，也就是由国家负担。从这个意义上讲，债转股给国有银行减轻了负担，这就为国有银行在加入世界贸易组织以后提高国际竞争力奠定了基础。

(三)必须从国民经济、国有经济的全局性战略高度综合整体解决国有企业问题

国有企业问题是一个历史性的综合的复杂问题，它涉及历史与现实、经济与政治、管理与技术、结构与总量、中央与地方、体制与文化等种种复杂因素，试图人为淡化或忽视某些困难的方面或问题，从最易于操作的微观层面机会主义地解决问题，历史证明决不可能。因此，我们必须突破以往总是从局部和微观这一层面，从一家家具体的国有企业的角度，从地域上行政上“谁的孩子谁抱”的角度来思考问题的模式，而应该从国民经济、国有经济的全局性战略高度综合地整体地从根本体制上解决国有企业问题。

对于从整体上搞好国有经济，我的观点可以表述为下面的五个层面：(1)只有搞好非经济体制改革，才能搞好经济体制改

革。(2)只有搞好国民经济，才能搞好国有经济。(3)只有搞好非国有经济，才能搞好国有经济。(4)只有从全面、总体和宏观上思考与综合处理国有经济，才能在局部、个体和微观上搞好国有企业。(5)只有从结构调整、体制变革、技术创新、观念更新等方面进行战略性综合治理，才能搞好国有经济与国有企业。

三、人民币汇率将继续保持稳定

东南亚金融危机以来，人民币汇率问题就一直成为国内各界乃至世界关注的焦点问题，在这里我结合当前最新形势就这个问题进行深入分析。

(一)不存在人民币贬值压力

人民币币值稳定具有坚实的基础，无论是在过去，还是以后几年内，都不存在能使人民币贬值的经济、金融和社会因素。从国际收支状况看，国际收支顺差和足量的外汇储备构成人民币币值稳定的坚强后盾。从我国国内宏观层面分析，尽管我国的经济增长速度在近几年有所回落，但依然保持了中高速增长速度，这对于人民币汇率稳定起着强有力的经济支撑作用。从市场开放度来讲，我国外汇市场是有限开放的市场，这不仅有效地阻止了金融危机的传导和冲击，同时也保证了人民币汇率的稳定。此外，我们还可以从人民币“黑市”交易价格来说明人民币不存在贬值压力。一般而言，如果官方汇率低于市场汇率，那么黑市价格则会矫枉过正，高于均衡汇率。近些年来，人民币“黑市”汇率与政府的管理汇率差别一直都非常小，这就说明不存在人民币贬值压力。

(二)人民币贬值对我国经济弊大于利

货币贬值只是一种手段，其目的无非是要刺激出口，以缓解需求不足与通货紧缩的矛盾，进而稳定经济和发展经济。但是，通过货币贬值在扩大出口的同时，也会使进口原材料、机器设备等进口成本增加；另外，贬值会使我国以人民币表示的外债数量增加，也不利于我国经济发展。

实际上，我国近两年来的出口下滑，其主要原因并不在于人民币不贬值，而是由于受金融危机打击的国家经济滑坡、需求萎缩从而减少了对我国出口产品的需求所致。并且从我国出口产品结构上来讲，占很大比重的劳动密集型产品已经趋于饱和，缺乏出口增长的空间，因此即使人民币贬值也难以使这部分产品出口量大幅度增长。另一方面，如果采取贬值的方法刺激出口，一次贬多少？幅度太小，杯水车薪；幅度过大，对东南亚国家雪上加霜，进而会引起竞争性贬值，这在对东南亚国家产生致命性打击的同时，我们并不能从中得到好处。

因此，尽管贬值可能在某种程度上能促进出口，但总的来讲，实施贬值策略可能得不偿失，弊大于利。所以人民币不应贬值，更不能采取主动贬值。我们选择了人民币不贬值策略，绝对不是像有些人所说的“打肿脸充胖子”。就目前而言，随着世界经济景气指数回升，我国产品出口量将随之增长。同时，国际资本对我国的输出也将有一定程度的恢复，因而人民币的贬值的压力和动力以及可能性就会更小。

(三)人民币贬值对谁有利

目前我国居民外币存款已经超过了320亿美元，同时还存在一批靠炒外汇生存的人和团体；另外，东南亚各国币值下降在一

定程度上增加了我国的出口压力，影响了我国出口部门的利益。这意味着已经形成了一个相当庞大的、具有相当实力的、特定的利益阶层，人民币贬值了，才能显示它们的强大，它们才能在经济上左右国际局势，才能加强受到金融危机冲击的国家对他们的依赖程度，同时排挤中国。在这种国际国内背景中，人民币不应贬值，贬值的结果将影响到中国经济的整体利益，还会引起国际上的竞争性贬值，对我国和东南亚乃至世界都不利。

(四)保持币值稳定，提高我国国际政治地位和信誉

在亚洲金融危机爆发前，我们预测大约在2010年左右中国可能会成为稳定亚洲金融经济的重要力量。然而亚洲金融危机的爆发突然把中国推到了世界金融经济舞台的前沿，让中国过早地承担起了稳定亚洲金融的责任。

中国在亚洲金融危机中表现出“风景这边独好”，诚如国外经济金融学家所说，我国资本项目开放程度低、体制相对落后等等，这些因素恰恰成为我国金融稳定的因素。国外经济金融学家不知道的是，尽管我们没有预测到1997年的东南亚金融危机，但我们实际上对这个问题总体上是有所观察的，在认识和思想上有了一定的准备并在防范金融风险方面做了方法上的研究。在亚洲金融危机之前的1996年7月，戴相龙等总行工作人员在北戴河向中央政治局汇报工作时，就已经提到了金融风险问题，随后就开始了强化金融监管以化解金融风险。在此之后，我国采取了一系列治理整顿金融秩序、防范与化解金融风险的实质性措施，所以我们经受住了这一场“风暴”的考验，“有惊而无险”，并被世界各国首脑和金融界公认为“中国是一个严肃的负责任的大国”。

四、对西部大开发战略的理性思考

西部开发是一个重大的历史性的战略决策，也是一个需要漫长的时期才能完成和实现的决策。美国的现代化进程经历了由北向南、由东向西逐渐推进的过程，用了150年的时间，我们的西部开发也决非短期可以奏效的。对这个问题，我从三个方面进行分析：

第一，关于“西部”概念的诠释。首先，“西部”概念是一个地域方位概念，因为它的外延就是包括四川省、重庆市在内的我国西部十省、市、自治区。次之，“西部”概念决非单纯的区域方位概念，它还包括诸如资源、生态、发展程度乃至贫困、发展前景等因素在内的其他含义。从某种意义上讲，“西部”代表着“后发展”，而“后发展”地区的发展则需要政策的扶持，需要一个较长的历史时期的过渡。如将西部理解为纯粹意义上的“后发展”，山西等省又不包括在内，这是矛盾和混乱的。

第二，体制改革的配套问题。如果体制改革、决策等一系列问题不能配套的话，在中东部开发过程中已经形成的2万亿的不良资产问题，有可能进一步扩大到西部。如果这样，又会形成大量不良资产，成为中国经济进一步发展的沉重负担，我很担心这个问题。

第三，政治效应问题。西部开发、经济发展、改革开放和社会稳定有着非常密切的关系，我们必须处理好这个问题。伊朗等国的历史表明，经济的发展将伴随着政治需求的提高，经济水平越发达，生活水平越高，许多政治方面的需求必将随之出现，从而带来政治上的不稳定。西部开发也同样存在这样一个政治后果问题，这是我们在经济开发之前必须考虑的一个问题。我们必